

即将到来的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赵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即将过去的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取得现在的成绩很不容易。而即将到来的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前，我们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社会各界就普遍关注经济失速的问题。事实上，全年实现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是没有问题的，人们的担心反映了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那么，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经济工作主线，会议强调明年工作是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显然，“三去一降一补”当中，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与降成本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现在重点是要“补”、要“强”。如果说“三去一降”的核心是偏向抑制，那么“补”的核心就带有扩张的意思。这也是稳增长所必然要求的。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过程中，经济工作的难处在于平衡多重目标。在理想化的描述中，多重目标都是兼得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多重目标的困境”，这个困境意味着很难找到一种激励方法让多重目标同时得到实现，这也就意味着多重目标可能是某种行为的扭曲。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地方环保工作的严厉程度可能就和经济数据的造假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因为很难同时满足环保要求和经济增长目标，两者同时满足就可能意味着某一个目标的实现存在造假。

这并不是说多重目标当中哪一个不重要，或者说永远得不到解决，而是说实现的难度和过程的艰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和防风险之间就需要进行艰难的平衡，出现我们常说的“两难抉择”。

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人们也普遍关注会议对于金融风险会怎么下结论。在对明年经济工作部署的三大攻坚战部分，会议指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

看到这样的表述，有观点就认为，这意味着在稳增长的背景下要弱化防风险。这样的解读至少很不严谨。在关于经济工作中形成的重要认识当中，其中一条是“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不能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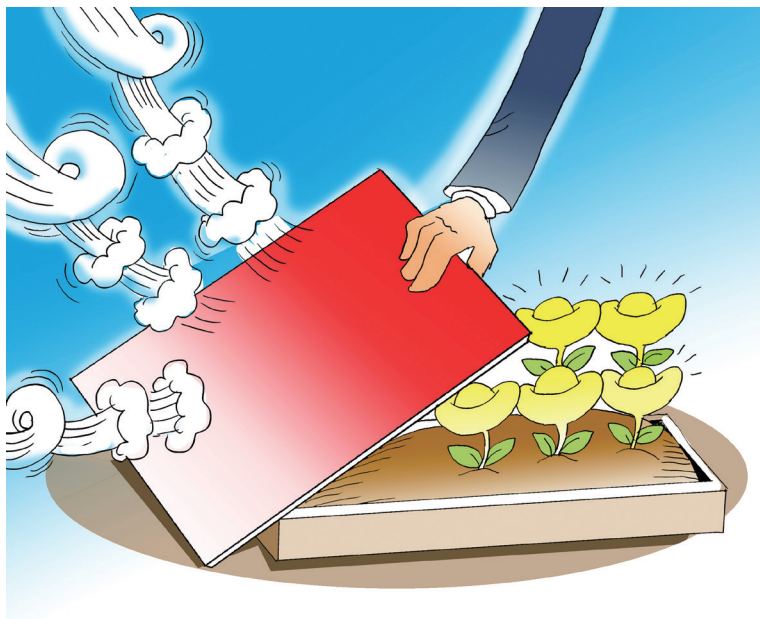
为这一条是放到最后讲，就变得不重要。如果从中得出结论，认为2020年金融监管政策不会在边际上继续增强，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监管会显著放松。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在时间计划上分三年推进，2020年是攻坚战收官之年，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整治，金融风险已经从快速积累逐渐转向高位缓释，暴露的金融风险正得到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总体收敛。其间，还发生了对包商银行实施监管的果断处置行动，遏制了包商银行风险向其他中小金融机构蔓延。有了这些实践和行动，才能下结论说我们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

根据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在对银行业的压力测试中，信用风险是30家参试银行的主要风险来源。在重度冲击下，30家参试银行全部损失中约80%来自信用风险损失，其中关键因素是压力情景下贷款质量恶化，不良贷款率上升。在轻度和重度冲击下，30家参试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从1.46%分别上升至5.42%和7.38%，贷款信用风险损失导致整体资本充足水平分别下降2.2个和3.92个百分点。

轻度冲击为GDP同比增速下降至5.30%，重度冲击为GDP同比增速下降至4.15%。由此可见，银行业主要风险来源是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为此，财政政策势必更加“积极”，而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重中之重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前的的问题主要是流动性在金融领域过度堆积，到不了实体经济。

从根本上说，我们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充分激发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



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会议也指出，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

这背后是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全国范围内的人员流动等，这不仅是区域一体化的需要，是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需要，也是实现资源更高效配置、推进创新的需要。☐